



TITLE:

中国の水症候与认知危机: 基于田野经验的散论

AUTHOR(S):

周, 雷

CITATION:

周, 雷. 中国の水症候与认知危机: 基于田野经验的散论. 京都エラスムス計画2011年度 中国社会科学短期集中プログラム成果報告: 京都大学・南京大学若手研究者共用フォーラム報告論文集 2012: 30-41

ISSUE DATE:

2012-01-16

URL:

<http://hdl.handle.net/2433/186306>

RIGHT:

中国的水症候与认知危机：基于田野经验的散论

周雷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

Babelwriting.org 创建人

缘起

帕菲特富有想象力的研究框架和理论阐述直接启发我研究昆明滇池这个发展和环境案例，正如我在三年多的研究过程一直所思考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不仅是滇池，许多中国人都能感受到一个具有家园意义湖泊的沦丧，能否对这些令人心痛的案例进行一种新角度的研究？要解释其中深层问题，探讨错综复杂的权力和知识关系网络，最好能找寻到一种新的解决路径。

我出生在江西，鄱阳湖离我家里不远，儿时曾和外婆坐着乌篷船飘一个上午到达吴城去看我靠在湖里打渔为生的叔叔；我所居住的县城有一条修河，为汇入赣江的支流之一，我童年的水上娱乐时常在此；离我家不到 400 米，是一个较大的半人工湖——白莲湖，有几个夏天我几乎每天在里面潜水，它是我的“历史水世界”；我的老家有个湖泊巢湖，我祖父的家位于项羽乌江自刎的芦苇地附近，那个县与马鞍山一江之隔，我多次从九江登船飘到自己的水乡；随后我在滇池附近的昆明生活了近五年，有一年直接住在西贡码头附近……但是，我这里提到的所有湖泊和水域都遭到严重的污染，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

我们要认识到，中国在实现其现代性的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压力，表现在水方面的危机，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现代性症候，这些水危机体现的不仅是一种因为技术、生活方式、规划不当造成的污染，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一种“欲望型痼疾”和“时间症候”。我知道这种描述可能有些费解，我想用举例子的方式来阐述。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在反思中国的环境问题以及政策的生态性，在西方学术术语中，他们把政府的管理系统和过程称为管治（governance），我们首先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理念、政策、制度的集成，然后这些制度性的因素通过人的能动性在特殊文化场景的中国表现出来。许多批评和分析都隐含着一种否定和建构的成分在里面，也就是说用一种观念和图景来否定另一种，同时确立一种“自然而然”的新规范和新目标。我们可以回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根本没有什么有机、绿色、环保、生态等观念，恰恰相反，我们那时候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某种程度上都是和“自然”反着来的，带着机器、机械、科学的冷冰冰、标准化、规模化的面孔。但是慢慢的，这种现代化开始出现问题了，首先当然是已经实现了这种现代化的西方开始反省，最后再转移到欠发展和欠发达的国家。我们时常有感觉，好不容易找到了发展和现代化的路径，速度也飞快，怎么最后发现效果并不好？中国在海外经常被人批评不注重环境保护，有时甚至被说成是新殖民，国内的环境生态确实也退化严重，人们也没有因此增加幸福感，这究竟是怎么了？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目前遭遇的许多生态困境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带来”和“构建出来”的，我们现在去质疑的管治方法、治理方式、经济方式、生活方式、科学系统某种程

度上都是和西方思维模板的“混血产物”。某种程度上，我们正经历着发展的“南辕北辙”，也就是说，从传统的中国思维里，我们的文化天然具有许多生态性的因素，只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以西方的马首是瞻，弱化了对“中国本土”和“中国特性”的深刻体察、文化守成和创新坚持，始终追逐西方视角或者说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观，最终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现代化的实现和后果，当然具有一些外显的特征，也有一些内核特质，我们在追逐“现代”的过程中，很像夸父逐日，明知道很累，但还是仿佛着了魔似的追，最后渴死，饕餮般吸干了所有的河流，化成邓林。同时，我们追逐的具体目标，很少有人去真正细心去阐释，为什么要去追逐它，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我们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吸收西方建筑元素，甚至一些西方的广场文化，小到一个建筑构件，都学习希腊、罗马、巴洛克，但是很少有人讲清楚这种追逐背后和现代化以及中国的国家命运有何种关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常“得形忘意”，或者“形意皆失”。

我们再来反思一段历史，这里我们不用去引述大量繁复和冗长的历史，只需要用一些我们学习的中学历史常识。我想用这组历史碎片来让大家反思，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一直想富国强兵、摆脱奴役、追求一种小康社会，为什么这个过程总是跌跌撞撞，如此辛苦？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认为，现代中国所遭遇的生态危机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因素，这些因素和上文中的西方和异族有着密切关联。我总觉得，中国人其实还是有些异族恐惧的，西方有个词叫 *zenophobia*（异族恐惧）。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族经常遭受一种来自“异族”的威胁，而在 1840 年以来，表现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异族”进攻，偌大的中华帝国被侵袭得体无完肤，中国和中国人在其内心深处至少植根了两组词汇：“文化见鬼”（文化意义上的“失魂落魄”）和“落后就要挨打”。从内心深处来说，中国在现代化和实现现代性过程中，很少时间是花在思考如何实现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性，更多的时候是想变得和欺负过自己的“鬼”（夷人）一样，这种心理很有趣（也可悲），直到现在许多受到极为良好教育的中国学者都在骨子里对西方形成终极认同，他们觉得只有在“国家心理图景”彻底西方化才能给含蓄、良善、阴柔的中华母体文化一种空间和生存可能。于是我们屡次在现代化过程中狂飙突进，多次对自己进行换血、脏器移植、切割整容。



（站在龍王庙上猫将军。在中国民间，向来有驱邪镇避的认知传统，如在庙强上吞噬对面“妖风”的这些陶瓷构建，这些器物用来建立一种内心秩序。在中国的近现代过程中，一种基于文化心理和文化认知深层的“见鬼和驱邪”因素是中国许多生态困境重要内因。从认知、意识、心理层面的构建和秩序整治，是解决中国生态困境的重要路径，否则我们将长时间受制于一种“现代化想象”和“发展谰纬”当中，深陷而难以自拔。周雷 2009 年 11 月摄于昆明滇池北岸。）

我们应该大约记得中学历史中的一个段落，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利用战争期间西方的相互杀戮，有一次短暂的“野百合的春天”。很多历史家都是从资本主义、西方化、现代化的思路下去思考这类历史，甚至走得更远去中国的历史中寻找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我认为这种思维本身就具有相当深刻的“见鬼”心理。在我看来，其实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或许是真正在现代性的这场时间游戏中万劫不复，原因之一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始损失一大批具有中国特性的“社会构件和思维构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所说的“社会构件和思维构件”，指的是我们从这个时间开始，经历着中国文化、思想、社会阶层的迅速西方化和范式转变，也就是说，那个《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梦溪笔谈》《水经注》《本草纲目》式的中国和中国人在肉体上消失了，代替他们的是缫丝厂、面粉厂、造船厂之类工业化和现代化机器里的产业工人和现代城市市民，也就是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嘲讽的城市人和现代性。

请读者仔细想想近期发生的一些新闻：现代城市集大成者的上海，开始重印一种开明国语读本，大家开始着迷一种褪色、手工、诗意的语言学记忆。不仅如此，我们看到 1900 年左右的中国城镇照片、书本、生活器具、农村的小物件、农具都觉得有种独特的时间美感和美学质感。把这种“怀旧”和中国当下实现现代性的过程结合更紧密些再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的都市管理者都看到了传统的重要性，开始大规模仿古、造旧城、建假古董，可是我们发现对于古代的模仿现在基本上不可能了，因为要实现这些效果的微观技术伴随着那些活生生的中国人和中国思维都消失了，从肉体上物理上消失了，我们的许多中国独门建筑技艺也许只能在日本，甚至柬埔寨和缅甸才能找到——在中国“文化见鬼”的那一刹那，我们把自己的“魂”给吓丢了。



（立交桥龍柱：这张摄于上海淮海路附近的龍柱，揭示了中国人生存语境的某些吊诡之处，一方面是极为“现代”的上海，中国城市成为各种器物意义上的活体陈列馆和“奇观城市”，另一方面，在心理深层，这个城市仍然具有许多根深蒂固的中国特性。图片中所摄的立交桥龍柱，据当地人描述，是因为在建筑时期，工程打钻经常失败，后来懂得风水的高僧指点，这里住着一條龍，必须在它离开的时候施工才行，最后依计行事成功了，但是高僧不日而亡，人们为破诅咒和风水改善，给柱体周身包上龍。周雷 2011 年 4 月摄于上海）

水症候与认知危机：学术假设和民族志举证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面做的一些陈述有些是有证据的，有些是属于个人的猜想，属于假想性的。可以这样理解，我给大家看的照片是眼见为实的部分，我说的解释的是耳听为虚的部分。

这张照片是我 2009 年 7 月份在滇池拍的，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滇池污染。我在写滇池污染的时候，实际上是把滇池污染当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实验室，我看污染是在一个大的历史当中怎么被放大出来，它的各种知识如何构建，如果有一个源污染，是否有一个认知原型，是否有一个元认知模式，所以我试图在污染当中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些声音是如何被遮蔽，如果被遮蔽了，是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

这张照片是我们经常吃的一道菜，叫韭黄，如果不把它焖黄的话就是韭菜。如果不割韭菜的话，一年可以割两茬到三茬，如果割韭菜的话，一年就割不了多少了。这是在滇池边上的村庄，他们靠韭菜和韭黄为生，这个产业至少有二十到三十年的历史。



（我一直认为，西南大旱的真正原因已经被这个标语深刻揭示出来了：“和传统的昨天告别，向规范的未来迈进”。周雷 2009 年 7 月摄于昆明滇池南岸。两周之后，这个写满标语的墙，以及周围的附属建筑，全部从肉体上消失，环滇公路将大量耕地和滇池旧景，联同城中村之类的建筑整体消灭。从社会学意义上，它造就一个阶层的重新流动和身份再造。）



（昆明滇池附近的壮阳物——韭黄的采摘和处理点，流淌的污水河，原来是清水涟漪的饮用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整体污染成为偶尔相对清澈的污水沟，种植韭黄和韭菜需要大量

化肥和农药，这些污染物重新流向滇池，同时滇池的污水再通过沟渠返回灌溉农田。停在一旁的汽车将这些蔬菜运往北京、上海、广州一带的超市，有些据农民说，运到了香港。周雷 2009 年 7 月摄于昆明滇池附近。)



(昆阳海上的航海者：这是我们向一个现代化方向前进的必须方式吗？被整村拆除的滇池北岸村落，某些村落是了解中国清末社会的绝佳处所，距离此不远是那个云南人引以为傲的航海家郑和和他的故里——昆阳。一度，昆明的滇池被称为昆阳海，更早期的当地彝族人称呼滇池为谷俄罗多海。2009 年 12 月，周雷摄于昆明。)

为什么我在讲水污染的时候提到韭菜和韭黄？这里其实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在一个城市污染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的组织架构和个体的微行为当中存在联系。韭黄和韭菜虽然在滇池生长，但是被卖到北京、上海、广州甚至香港。城市污水通过排污管道进入湖泊，再回到灌溉区灌溉了这些韭菜，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回到滇池，这些被公众认为吃了可以壮阳的东西再返回到城市和城市化过程当中。

我们是否看到城市化过程中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雄性假想？每个城市在做国际中心、研究中心或者国际城市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基于雄性的张力，这是不是跟这个有关联？我们在日常的行为当中，比如我们在任何一个北京、上海或者广州的白领，他在一天之后会非常疲惫，非常劳累，他们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污染当中有一些小的行为和认知原式如何放大一个社会的集体症候。

我们再想想另外一种解释。首先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病态存在身体意义上的泛化。我们看中国城市的危机，单看水的危机是不够的，这里需要有医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我们在把中国文化当成一个身体和病症的时候，我举个例子。

第一个假说，前面已经提到，我在此再作简单具体分析。中国人都有《水经注》式的环境和认知模板缺陷，当然我是基于本体的认识来说这番话，没有太多证据。人类学有一种方法是自我民族志，就是把你自己的经验当做一个数据库来反思个体生活的经验有何意义，任何一个中国人基本上都有一个经验，他生活的环境曾经都是有水环绕的，或者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环境。我们在看《水经注》的时候，或者早期中国文献的时候，已经构建了一个生态意义上非常完好的中国。而这个认知模板被我们的教育过程强化了，大家想想，中国以水或者以三点水命名的城市的名称或者区域的名字有多少？你再看那些地方是不是真的还有水？如果有水的话，看看你周围的城市已经污染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经典当中原典型的中国已经消失了，必须要在你的认知当中纠正过来，就是中国已经不是我们古书里面和任何一个汉学家能够描述的，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认知缺陷，不要有假想。

第二个假说，中国是信风水的，有一些人是科学出身，他会说风水有一点的道理，但是他觉得风水不是科学。我觉得只要是中国人，一般多少信一点风水。而风水有一个特别糟糕的生态效果，风水观在客观上让中国人从集体上和群体上好像可以修正自己的行为，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假想，如果外面大环境是污染的，我们幻想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到一个抗污染的个人独家秘方。比如我们住的小区环境很好，我们会不断的谋求一个小环境的生态良好，我们会找一些比较好的风水方案来“补或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我们总是能够找到一个方式，即使有那么多的食品安全危机，中国的污染和环境也非常恶劣，但是我们如果在北京的某一个很好的小区买一个房子，似乎抵消了一部分的痛苦。虽然环境已经恶化到一定的程度，但是我们仍然幻想，通过这种风水观的适度使用，甚至通过简单的装修来微调人的生存环境。

这样说来，城市的生态危机和认知的症候，其实是一种异形共构，我们发生在个体上的疾病实际上也在城市当中体现出来，反之亦然。

接下来给大家看几张图片。这是我在四川成都拍的一个照片，是建在药店楼上的药膳，里面所有吃的东西基本上都有医疗功能，所以我称之为 Foodcine，这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揭示了我们中国人深信不疑的一种补的概念，通过个体的饮食来修正环境的概念。这是一道菜，锁羊茶香虾球，雄性迷恋确实是一种非常古怪的认知方式，大家回去想我们日常的饮食是不是被医疗化了？即使你看任何时尚杂志，他搞的那些花花绿绿的生态饮食是不是也被医疗化了？

这个地方不是农村，我说的农村是生态意义上的农村，这是一个绿色工程，这是我在西双版纳原始雨林拍的一个照片，那个地方原来是原始雨林，现在做成了蔬菜棚，种豇豆、南瓜、黄瓜等，统一被再卖到上海和北京。你无法想像，在西双版纳已经很遥远了，似乎是最后的一个方舟，但不是了，有人在那里包了地，把树砍了之后种蔬菜，然后再卖过来，我去的时候看到他们在打农药，所以不是生态的，但是你会有一个生态假想。

这个照片是在德宏拍的，这个地方原来不种甘蔗，你去云南看的话，你把所有的植物象征成一种生活方式的话，你会看到那个地方全部被工业化了。云南现在种澳洲坚果，因为白领爱吃坚果，种星巴克的咖啡豆，他们把这个地方传统的生态全部替换了，改种甘蔗，种甘蔗的

后果就是造成地下水的污染，因为他们用的肥太猛了。我们作为城市的人品尝甜味的时候，生态后果是留在当地的，当地人打井水越打越深，我调查的时候已经到 30 多米深了，出来的水已经有咸味。



（周雷 2010 年 12 月摄于西双版纳。处在“热带雨林”的蔬菜地，这里生产蔬菜统一送往中国的一线发达城市，许多承包者为四川和浙江的客商。精明的生意人，已经利用了城市人的污染恐惧，把热带雨林转为城市人的蔬菜基地——当然这种蔬菜不是城市里老百姓消费的日常蔬菜，而是吸收自然雨露的“高端有机蔬菜”。）



（由于“市场看不见的手”，都市的生态危机和都市人的生态认知，西双版纳的农民将大象光顾的湿地转耕为蔬菜基地，为城市提供有机蔬菜。周雷 2010 年 12 月摄于西双版纳。）

结论

话题至此，真正的公共环境运动和生态革命的出路水落石出：那就是回到城市、回到都市人、回到现代性、回到生活方式的反思、回到污染的元认知。未来中国城市的生态未来，取决于都市人的自觉、自在、自为、自责、自律、自省。

围绕着城市的现有格局，尤其是城市垃圾的“文明遗产”，应有更多的环境组织和项目进入，不应停留在宣传栏海报和公益宣传上，应该通过设计、知识、技术、行为干预来整体修正城市已经恶化的生态环境。

应该对上海世博会的城市主题进行更为立体、持续、深入的研究和知识传续。上海世博会或许本应有更为独特的举办方式：将杭州、上海、南京的高铁系统，发展成为一个移动的展馆输送系统、流动场馆和高铁媒体群，可以支持知识的共享、数据下载、搭乘时间的即兴讨论和城市知识移动播放。许多在城市发展方面有独特传统和现代科技的国家可以沿着高铁沿线铺设知识融合城市，如杭州、上海、南京、昆山、苏州、镇江等沿线城市都可以通过与国外城市模式的知识融合发展成为一种不断生长的智能城市模式，并不断繁衍新的产业带、知识生产中心、生活方式改良中心。

中国在经济上最为富足的城市群不应仅仅进行基于硬件的海量投入，打造一个外表富丽堂皇的列维坦式城市（巨兽式的城市），他们最应该最先发展成为一个城市的智者，而不是一

个不断输出错误模板、破碎理念、低级欲望、高度污染的生态恶源。



（周雷 2010 年 12 月拍摄于西双版纳一户农民家的白砂糖袋。虽然品尝起来是甜的，但是不当的甘蔗生产和过度扩张，容易产生许多工业化单一植物种植都会有的害处，它的“苦味”多半为当地农民承担。联系这一点，再来想想中国城市人群的代谢紊乱和糖分剩余——糖尿病和肥胖症的蔓延。德宏的当地人用味蕾来区分彼此和外地人：辣山头（山头指景颇族）、酸摆夷（傣族）、苦傈僳（傈僳族，许多食物有苦凉特质）、臭崩龙（德昂族，某些食物具有“臭豆腐”的臭味）、甜汉人（汉族）。



（周雷 2010 年 12 月拍摄于西双版纳的一家村庄杂货铺。在满足了城市人的欲望和自我生产之后，我们仔细看看他们日常的食物和消费是什么？这预示了中国生态、城市、城镇化

的何种去向？)



(西双版纳的城市化未来是否只有这一种模式？周雷摄，景洪市郊，2010年10月14日。)



我给最后这张照片取名为“丽江的今天，西藏的明天”：这个描述如果指的是自然，怎么看都像是谶纬。当我 2004 年第一次来丽江的时候，我用北京的生存经验相比，感觉俨然一个天堂。只是在当地生活了二十年的纳西朋友告诉我，这算什么，你没看到丽江二十年前的样子。我在云南生活了将近四年之后，我对此深有感触，所以，为了弥补视觉误差，我在描述丽江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更为原始的地域——西藏腹地的然乌湖。周雷 2005 年 10 月底摄于一次西藏的考察。从这个冰川，我们来想念那个一度自然、封闭的丽江古城，还有巍然耸立的玉龙雪山——已经离我们远去了。